

六朝“异物志”科学价值论述

郁冲聪

提 要：六朝时期，人们在边地实践活动中积累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彼时各类科技著作也集中诞生，构建起了“中心”对“边地”的知识型认知。其中尤以六朝“异物志”最具代表性，它们跳出数术和训诂思维模式下的观物方式，开启科学观物模式。六朝“异物志”承载起中古时期介绍新增自然科学知识的时代使命。本文从记录新知生物的地理分布样态、记录新知生物种类的丰富性、清晰的知识归类思维和超前的科学认知水平4个方面，论述六朝“异物志”的科学价值。最后，通过梳理六朝“异物志”所载知识在后世的承袭与散播，考察此类著作对中国古代博物之学的特有贡献。

关键词：六朝 异物志 科学价值

汉魏六朝时期，人们掌握的边地地理知识和物产知识都在迅速增加，这一现象与当时汉文明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自汉武帝经略岭南、西域等边地以来，东汉六朝等政权都延续边地拓殖这一政策，从而促进汉文明与周边异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深度交流，其中物质文明交流也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与“灵异世界”不完全区分的中古时期，“中心”观照“边地”的方式是多元的，其中六朝“异物志”所表现出来的体察方式，是最具理性思维和科学色彩的一种。“异物志”是一类而非一种著作，现可查证的年代最早的“异物志”，是东汉后期杨孚所撰的《交州异物志》，绵延至明末清初时，还见有文士零星创作。^①六朝时期，“异物志”的创作进入全盛状态，汉唐间大约发现了21种“异物志”，除孟瑄《岭南异物志》、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和佚名《岭表异物志》等少数几种外，其余均为六朝作品。^②不同于唐代“异物志”已近志怪小说的写作笔法和具有浓郁文学风格的文本属性，六朝“异物志”是不折不扣的科技著作，也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上第一批集中诞生的具有“格物”精神的专著。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就有追求博雅君子人格的志向。而在六朝“异物志”之前，识物、辨物、志物的工作通常是零星进行的，相关成果分散在经注、史注、字书、词书、韵书、本草经等各类文献中，未能像六朝“异物志”一般形成写作风潮。较之张华《博物志》、崔豹《古今注》等同时代杂考杂录各色名物与地理知识的子书，六朝“异物志”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是志录新知边地物产知识的专著；较之《广州记》《交州记》

① 按，学界认为“异物志”在唐后已经式微甚至绝迹，笔者在整理文献时，又发现了两种明清时期的“异物志”，一种为陈鼎《异物志》，一种为王世贞《异物志》，其中陈作有目无文，而王作仅存一条“木莲花”的佚文，无法判断其文本属性。

② 王晶波曾统计汉唐间“异物志”的种类，共计发现有21种之多，分别为：杨孚《交州异物志》、朱应《扶南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谯周《巴蜀异物志》、续咸《异物志》、宋膺《异物志》、佚名《凉州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曹叔雅《异物志》、孙畅《异物志》、佚名《南中异物志》、佚名《南方异物志》、佚名《南中八郡异物志》、佚名《郁林异物志》、郭氏《异物志》、沈如筠《异物志》、孟瑄《岭南异物志》、房千里《南方异物志》、佚名《岭表异物志》（参见王晶波：《〈异物志〉的编纂及其种类》，《社科纵横》1999年第4期）。其中不乏有一些同书异名的情况，如佚名《南中异物志》和佚名《南中八郡异物志》实际为一种著作。又有部分遗漏的著作，如薛瑄也撰写有《异物志》。

《凉州记》等六朝私撰边地郡地，六朝“异物志”的内容要单一得多，其关注点更多在“物”上，对于山川、道里、先贤、民俗等驳杂内容不甚涉及；较之同样志录当时新知边地物产的《南方草物状》《广志》等书来说，六朝“异物志”种类更多，形成一种写作风尚，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可以说，六朝“异物志”以其科学精神和独特的书写内容，开启宋人“格物穷理”的先河。它也是中国古代庞大地志系统与地记系统中比较独特的一种，有必要单独进行讨论。

由于六朝“异物志”所记载的丰富自然科学知识，前辈学者对这类特殊著作多有关注。如我国著名农学家缪启愉曾专门辑录六朝“异物志”和其他边郡地记中的热带植物部分，进行名物训释，并试图呈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对热带、亚热带植物的认知状况^①；张崇根挑选《临海水土异物志》一种进行笺注，旨在探知汉魏六朝时期我国东海海域及海滨地区的生物样态。^②丁海斌在《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史》一书中，曾胪列《扶南异物志》《南州异物志》《临海水土异物志》3种，主要是举其文献散佚情况、陈其著述内容梗概，对其中的科技内容也有所提及。^③此外，学界还会就某一具体研究问题来征引六朝“异物志”佚文进行文献佐证，如《中国农业通史》在论述秦汉时期岭南稻作问题时，征引杨孚《异物志》中一条“交趾两熟稻”的佚文。^④这类将六朝“异物志”作为零星的文献例证的情况不胜枚举，但目前学界还缺乏对六朝“异物志”独特科学价值的系统梳理，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展开研究的。

一 六朝“异物志”的科学观物思维及形成原因

人类在大自然中繁衍生息，“辨识万物”是古往今来人们都必须面临的一大课题。“物”并非孤独存在的客体，而是时空流动和普遍关联中的整体。观物方式不同，就决定对“物”的认知也具有多面性，认知殊方异物也不例外。笔者归纳，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的观物方式大致有3种思维方式：第一种是方技数术思维，以《山海经》、历代正史“五行志”和部分志怪小说如《神异经》《十洲记》为代表，其中所志录之“物”，其形象出入于“自然之物”和“灵异之物”之间；第二种是“小学”学术路径影响下的名物训诂思维，以《说文解字》《尔雅》《广雅》等字书、词书为代表，注重对“物”进行称名问题的辨析；第三种则是科学的观物思维，以六朝“异物志”为代表，其关注点在于探索“物”的自然性状问题，以达到认知“物”的自然属性。六朝“异物志”求真务实、科学理性的观物思维，也决定其科技著作的文本属性。

朱渊清观察中国古代博物之学发展，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这一时期对“物”的描述开始趋于详尽，学术关注点也逐渐从注重训释“称名”，转向关注物理、物性、物色等本体问题。本文通过表格直观呈现汉魏间这一观物方式的转变（详见表1）：

① 参见缪启愉、邱泽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

② 参见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

③ 参见丁海斌：《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3—124页。

④ 参见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367页。

表 1 汉魏六朝间观物思维演变表

物种	书籍内容			
鸚鵡	《山海经》	《说文解字》	吴万震 《南州异物志》	晋郭璞 《山海经注》
	有鸟焉，其状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	鸚鵡，能言鸟也。从鸟，嬰声。乌荃切	鸚鵡有三种，青者大如乌白，白者大如鹅。五色者大于青者。五色者出杜薄州也	鸚鵡舌似儿，扶南徼外有。色如赤，有纯赤。赤者大如雁也
翡翠	《说文解字》	《尔雅》	东汉杨孚 《交州异物志》	东吴万震 《南州异物志》八
	翡，赤羽雀也。出郁林。从羽，非声。翠，青羽雀也。出郁林。从羽，卒声	翠，鹇	翠鸟，先高作巢。及生子，爱之，恐堕，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复益爱之，又更下巢也	翠惟六翮，毛长寸余，青茸。翠大于燕，小于乌白
駿驪	《山海经》	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	佚名《仓颉解诂》	刘宋沈怀远 《南越志》
	鼓亦化为驪鸟，其状如鸚，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鸚，见则其邑大旱	駿驪，鸞也。从鸟，夂声。私润切	駿驪，神鸟，飞竞天汉。以为侍中冠	增城县多駿驪。駿驪，山鸡也。光彩鲜明，五色炫耀，利距善斗。世以家鸡斗之，则可擒也
羴羊	《山海经》	《尔雅》	十六国宋膺 《凉州异物志》	晋郭义恭 《广志》
	钱来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而马尾，名曰羴羊，其脂可以已腊	羊六尺为羴，谓此羊也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宾客，亦稍自补复；有羊大尾，车推乃行，用累其身	大尾羊，细毛，薄皮，尾上旁广，重且十斤，出康居

(续表)

物种	书籍内容			
	西汉司马相如 《子虚赋》	托名东方朔 《神异经》	吴万震 《南州异物志》	晋徐衷 《南方草物状》
椰	留落胥邪，仁频并闾	东南荒中有邪木。邪高二三丈，或十余丈，围丈余，或七八尺。叶三百岁尽落而华，华如甘瓜华。华尽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岁而熟。熟后不长不减，形如寒瓜，长七八寸，径四五寸	椰树，大三四围，长十丈，通身无枝。至百余丈有叶，状如蕨菜，长四五尺，皆直竦指天。其实生叶间，大如升，外皮苞之如莲状。皮中核坚，过于核，裹肉正白如鸡子，著皮，而腹内空。含汁，大者含升余。实形团团然，或如瓜簍。横破丈，可作爵形，并应器用，故人珍贵之	椰，二月花色，仍连著实，房相连累。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树黄实，俗名之为“丹”也。横破之，可作碗，或微长如栝簍子；从破之，可为爵

限于篇幅，上表仅挑选几种具有完整文本脉络的物类，从中可清晰地看到上述3种不同观物方式下形成的物类记述文字：

第一类是“方技数术”思维，以《山海经》《神异经》等文献为代表。方技思维注重服食功效，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如《山海经》称“祝余”一物“食之不饥”，称“迷谷”一物“佩之不迷”，称“狴狴”一物“食之善走”。方技思维在战国秦汉时期影响深远，出土文献中常可见到，如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万物》一篇，其行文的文本格式与《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部分极为相似，也带有浓郁的方技思维，如“石番之令弱（溺）不遗也”（W003）、“石鼠矢已心痛也”（W007）、“蚕卵之可以免列（裂）也”（W012）、“鱼与黄土之已痔也”（W018）等。^①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山海经》与《万物》等出土文献有着相近的文本性质，甚至连句法形式也比较统一。^② “数术思维”则是一种先验思维，认为“物”与某种吉凶征兆之间存在对应的关系。例如，《山海经》中经常见到“见则多土功”“见则多放土”“见则有大乱”等预兆性质的文字。这一思维在后世正史《五行志》中也时常有见到，甚至在比较追求科学实征的六朝“异物志”中还有些许残存。

第二类是“训诂思维”，以《说文》《尔雅》等字书、词书为代表。它们遵循“小学”的治学路径，注重对字音、字形、称名等问题的训诂，同时也附录有简略的阐释性文字。这类训诂文

① 参见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1988年第4期。

② 参见刘钊：《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字通常非常简短，格式常为“某，某某”，后者是前者的同物异名。另外，通过对比《尔雅》原文和郭璞注释，也可以发现魏晋释名之学更加注重对物性的训释，如《尔雅》只简略记载：“杨，枹蓊。”郭璞则将之发挥为：“似蓊而肥大，今呼之马蓊。”《尔雅》原文称“蓊，王蓊”，郭璞注则详注为“王帚也，似蓊，其树可以扫蓊。江东呼之曰落帚”^①。显然郭璞注不仅包含称名的问题，还包含对该物之物性、物理、物色等问题的阐释。

第三类便是“科学思维”，以六朝“异物志”为代表。它们更注重以科学理性的观物思维来考察物类的自然属性。通过上表，我们也能够发现以六朝“异物志”为代表的科技著作与方术文献在记物方式上的差别，同样是关注“椰”一物，在《神异经》中它是能寿300余岁的神木，而《南州异物志》则只把“椰”看作普通果物，具体描述其物理性状；而同样是关注“翡翠”，《说文解字》是关注“翡”与“翠”二字的字音和字形，《尔雅》则只解决称名问题，只有《交州异物志》和《南州异物志》是关注“翡翠”具体物性的。再通过对六朝“异物志”与《释名》《急就篇》等汉代文献，也可以发现两者记物风格的不同：六朝“异物志”的记述方式普遍比较详尽，对物自然属性的各个方面都有关注，而《释名》依旧遵循“小学”的学术范式，如释“浆”：“浆，将也。饮之寒温多少，与体相将顺也”^②，是先以别字注音，之后简略释意，对其自然形状几乎没有涉及。史游编纂的《急就篇》则是汉唐间大约600年间最重要的童蒙教材。在居延甲渠侯官中还发现两行《急就篇》的木牍（简号EPT5：14），另外在敦煌地区也发现不少汉人手抄的《急就篇》断简，可见该书影响之大、传播之广。翻阅《急就篇》，可以发现该书主要是将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编纂为口诀，如“葵韭葱薤蓼苏姜，茺荑盐豉醢酢酱”^③，其中“姜”与“酱”同韵，朗朗上口，方便记诵，而其中所提物名，多为日常饮食中的常见之物，但释物性质的文字并不多。

那么，六朝“异物志”为什么会形成科学观物、详于记述的学术规范呢？笔者认为，《尔雅》《释名》《急就篇》等记载的大多属于历代累积的、陈旧性的知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识”，已然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无需大费周章地付诸纸笔。汉魏六朝时期的“世界”在不断扩大，各类新鲜事物不断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观也自宜更正。六朝人常发出宇宙无穷的喟叹，曹魏史官鱼豢就说：“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④既有“新知世界”，就会有“新增知识”，沟通六朝人与“新知世界”的桥梁，正是“异物志”。王庸曾在20世纪30年代评述六朝“异物志”的文本性质时指出，这类著作大抵是为了“传播知识，藉广见识”^⑤。

六朝人深入新知边地，在亲身实践中完成体察万物、积累实用知识的工作。刘宋戴凯之的《竹谱》记载全国各地大约70余种竹子品类，他将自己的写作经验总结为“人之所知，事生轨蹻”^⑥，“轨”就是车轮的印迹，“蹻”就是马蹄的印迹，“轨蹻”可以引申为实地考察的意思。笔者翻阅六朝人的书信，也能发现当时人将“异物志”看作一种科普工具书。西晋陆云的《与车茂安书》是一封为即将赴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的车永（字茂安）的外甥石季甫解答当地土

①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8《释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25页。

②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4《饮食部》，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7页。

③ 史游撰，颜师古注，王应麟补注，钱保塘补音：《急就章》，《丛书集成初编》第1052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本，第11页。

④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863页。

⑤ 王庸：《汉唐间之异物志》，《史地杂志》1937年第2期。

⑥ 戴凯之：《竹谱》，《百川学海》第30册《癸集上》，民国16年（1927）武进陶氏涉园影宋本，第9页。

宜风物的书信,由此来缓解车永全家因为不熟悉南方风土而产生的恐慌情绪。之后,车永回信赞扬陆云知识淹博,称:“足下此书,足为典诰,虽《山海经》《异物志》《二京》《两都》,殆不复过也。”^①“典”与“诰”是《尚书》中的两种文体,也被后世认为是文章的经典范式。车永称赞陆云之文“足为典诰”,自然也有奉迎之意,但也说明陆云之文表里皆美、比肩经典。陆云本是吴人,自然熟稔东海土产,但对于车永这样的中原人士而言,就只能通过“异物志”和汉大赋等文献来了解陌生的南土。又如,颜之推曾援引《临海水土异物志》来批评当时文学中的“用事之误”:“《异物志》云:‘拥剑状如蟹,但一螯偏大耳。’何逊诗云:‘跃鱼如拥剑’,是不分鱼蟹也。”^②可见“异物志”也是当时人“考究事典”援引的权威科学著作。

总之,作为科技著作的六朝“异物志”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外部世界不断扩大的中古时期,人们需要获得更多实用性的知识。在这种生存环境中,通过实地考察,来科学地观测万事万物就成为—种时代需求,六朝“异物志”正是这种实践活动的产物。所以,也有学者指出,六朝时期部分私撰州郡地记,都是“前方”向“内地”传递风土知识情报的时代产物。^③

二 六朝“异物志”所记新知生物的地理分布

影响生物地理分布的因素有很多,不仅取决于物种本身的散布能力,也受到时空因素的制约。要了解我国历史时期自然生态环境的状态,古籍中的生物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参证。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和动物变迁研究》—书,考索我国历史时期动植物的地理变迁,其基本方法就是利用大量先唐私撰地记、明清地方志和历代地理笔记等文献进行考证。陈桥驿也曾根据《水经注》来分析北魏时期动植物的分布样态。王子今在阅读张衡《南都赋》时,也指出汉代的南阳地区曾拥有丰饶的山林,并能进行甘蔗、柑橘等热带、亚热带作物的栽培。^④

六朝“异物志”也为今人了解中古中国广大边地的物种分布样态提供宝贵资料。从佚文内容来看,六朝“异物志”所书写的“新知世界”非常广袤,包含今长江下游地区、岭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包含河西走廊和今中国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其中,《扶南异物志》《南州异物志》的目力甚至越过赤道,记载今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鲁古群岛、尼科巴群岛等太平洋岛国的地理信息,这也是一片汉代文献未曾谈及的神秘区域,显示出极强的探索世界的能力。笔者考订各家“异物志”的具体成书时间,最早的杨孚《交州异物志》约成书于东汉后期,《扶南异物志》《南州异物志》《临海水土异物志》是东吴中后期作品,《南中八郡异物志》是西晋中后期作品,《凉州异物志》则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作品。此外,还有几种边郡地记和地理笔记中的物产信息也值得注意,如《交州记》《广州记》《南越志》《广志》和《南方草物状》等,它们都是晋宋间的作品。要之,上述文献大致能反映汉魏六朝时期对新知边地物产信息的掌握程度。自然环境的演变是漫长的,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巨变,因此这一批六朝“异物志”为代表的著作也成为记录公元3—6世纪我国边地生物地理分布信息的珍贵资料。

本文简略陈述中古时期我国各片新斥边地的生物地理分布样态。先看长江下游以及东海海域,以这片地域为书写范围的“异物志”主要是东吴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数量丰富的长江下游水生生物和东海海洋生物,其中海洋鱼类如比目鱼、石首鱼、乌贼、鱼牛、海鳅、鲷

① 严可均辑:《全晋文》卷109《答陆士龙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55页。

②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4《文章》,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第287页。

③ 参见魏斌:《东晋士人的风土阅读与故国认知》,《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

④ 参见王子今:《〈南都赋〉自然生态史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辑。

鱼、土奴鱼、燕鱼、鳶鱼、鲟鱼、招潮子等，淡水鱼类如鲢鱼、鳊鱼、鲤鱼等，另外还有很多暂时无法训释的鱼类，如机杼鱼、新妇鱼、鯢鲍鱼、蝦蟇鱼、弓鱼、黍鱼等。《临海水土异物志》中有几种生物颇值得关注。例如“鲔鱼”，中国古代将“鲨鱼”称为“鲔”，这是一群鳃裂位于侧面的板鳃鱼类的统称，《临海水土异物志》中记载了一种“腹下正白，长五尺”的“鲔”，应该就是“灰鲔鲨”，属鼠鲨科，通体青色，下侧腹部呈白色，卵胎生，可长达4米以上，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海和东海海域。又有长3尺、长着黄色斑文的“虎鲔”，属虎鲨科。我国东海有狭纹虎鲨和宽纹虎鲨。又如“海豨”，汉晋间南楚一带称“猪”为“豨”，所以“海豨”就是“海豚”，俗称“海猪”。根据《临海水土异物志》、郭璞《江赋》等文献，当时长江水域多江豚，东海海域也常有海豚出没。

再看岭南地区和中南地区。岭南很早就已与中原文明相交通，《韩非子》中也已有“交趾”地名，秦代还有所谓的“五岭之戍”。这里地处热带，所以气候、物产都迥异于内地，这些风物土宜都引起中原士人极大的兴趣，岭南地区“异物志”也占据该类著作总数量的大半，其中所涉物类更是多不胜数。我们通过六朝“异物志”可以观察到，有几种著名的岭南果物在当时就已进行人工栽培了，如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称：“龙眼，如荔枝，而小圆如弹丸。味甘胜荔枝。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山中人家亦种之”^①；又如“槟榔”“荔枝”“椰”“橄榄”“榴”等几种果品，在当时都有比较稳定的年收成，能够做到“常献之”。并且，通过《南中八郡异物志》的记载，我们还能发现当时地处长江之滨的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也能种植荔枝，并形成这一果品的贸易。这也可以看出历史时期“荔枝”的分布，其北限较之今日纬度更高。在《交州异物志》《荆扬已南异物志》等几种“异物志”的描述中，今湖南南部、江西南部 and 两广地区都属于地广人稀的荒蛮之地。汉文明的影响力主要是沿着交通主干道深入当地的，呈现“点”与“线”相结合的方式渗透，而当地的深山纵谷之中，则依旧是“蛮”“俚”等土著的聚集点。在荆、扬两州南部的广袤大地上，森林成荫，飞禽走兽很多，到处可以看到杉鸡、锦鸡、骏驥等俊美的禽鸟；《庐陵异物志》还记载在今赣南的山区尚能见到山都，即豚尾狒狒，自然生态环境与今时有很大的不同。

再看西南地区。在《史记》中，这片包含今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云南省全境的区域被称为“西南夷故地”，当地在汉魏间又有一个更具人文特色的地理概念，被称为“南中”。这片区域属于“内部的他者”，汉人政权虽已在当地开郡置县，并完善五尺道、零关道、博南道等交通主干线，但由于当地地形复杂、交通闭塞、瘴气横行、族系复杂，所以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区域文化底色。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前后长达30余年，之后的历代中原政权也都在持续开拓南中地区，尤以蜀汉的经营最为筚路蓝缕、胼胝手足。汉晋间也有多种南中地区的“异物志”问世，如譙周《巴蜀异物志》和魏宏《南中八郡异物志》，其中有许多汉魏六朝时期南中生态环境的内容。《巴蜀异物志》虽存佚文不多，却记载一些当时不甚有人关注的巴蜀南部地区的生物，如称涪陵县出产一种灵龟，其甲可用于占卜。任乃强认为：涪陵故陵西溪出产大龟，所以又名“龟溪”^②。另外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今滇西南地区，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动植物王国，拥有丰富的物种，犀、象、獬、封牛、猩猩等都是当地常见的兽类，翠鸟、孔雀、鹦鹉等则是常见的禽类，正印证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吴都赋注》引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213页。

② 参见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鱼复县”条注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左思《蜀都赋》所描绘的画面。六朝“异物志”中所记的生态信息甚至能与今日实况相佐证，云南德宏大盈江的秋季还有大群绯胸鹦鹉翔集空中；位于今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中的野象谷，也是我国唯一一个亚洲象的栖息地。另外，《南中八郡异物志》《华阳国志》等文献都提及兴古郡（今云南铅山）的土著民鸠獠，以莎木树干中的面粉充饥。莎木是桃榔的别名，属棕榈科桃榔属，是一种茎秆粗壮的热带乔木，今海南、广西以及云南地区都有出产。兴古郡正好地处云南东南部的河谷地带，气候煊暖，所以桃榔木能存活。

最后看西北地区。这片区域包括自汉代以来直接纳入中央郡县体系内的河西走廊，以及通过都护府管辖的西域地区。《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志》《后汉书·西域志》等文献在记述西域国度与中央政权政治经济关系的同时，也会志录一些西域物产，但都未及“异物志”般详尽。《凉州异物志》《南州异物志》中都著录了大量西域动植物，尤以畜类最具代表，有水牛、封羊、山羊、犬^①等。其中有一种被称为“大尾羊”的畜类最具传奇色彩。在《凉州异物志》的描述中，大尾羊是一种具有肥大尾部、被用作拖车动力的大羊，并称在月氏国很常见。《广志》曾载康居国也出产这种大尾羊。饶宗颐认为，大尾羊就是《山海经》中的“臧羊”，《尔雅》称为“麇”^②。日本学者榎一雄持与饶宗颐相同的观点，并认为大尾羊在中古中亚分布很广泛，除了充作肉食之外，也用于推车和贸易。^③余太山、李锦绣在注释《通典·西戎传》中“大月氏”条时，也认为大尾羊实则就是“臧羊”^④。另外，《马可·波罗行纪》中也多次提及中亚的“大尾羊”，这种身形高大、体格强健的羊被认为是帕米尔高原上野性的象征，它生活在由帕米尔高原向外辐射的几条世界上最为高峻的山脉带上，如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脉。这种羊当时在哈刺兀纳地区，也就是公元初的大月氏国领土上很常见。^⑤

总之，通过钩沉并解读六朝“异物志”的佚文，并广泛结合其他史志文献，可以勾画出一幅生动的生物分布的地图，对深入研究中古自然史是有一定裨益的。

三 六朝“异物志”所记新知物种的丰富性

本文大致将六朝“异物志”所记之“物”分为3类：第一类是前世文献已见记载、但较为简略的；第二类是从未见于前世文献的新知物种，这类占比最大；第三类是见于六朝“异物志”记载、但至今仍无法训释的。

先谈第一类。六朝“异物志”部分物类已见于先秦两汉文献之中，但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留下详细的描述性文字。如上表中“榔”一物，《上林赋》中只有“胥邪”一名，同时代的《史记》中则写作“胥馀”，东汉张衡《南都赋》中则写作“楮枒”。从这些物名也不难看出，“榔”这一物名最早是一种音译。杨博文先生猜测“榔”或是马来语 Kayu 的对音，意为“椰花酒”^⑥。关于描绘“榔”具体物理性状的文字，直到六朝文献中才逐渐多起来，除了上表胪列的《南州异物志》《南方草物状》之外，刘欣期《交州记》和佚名《异物志》中也都有详述。除

① 按，《凉州异物志》未言明犬种，只称该种犬如驴，希见其牙。

② 参见饶宗颐：《说臧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8卷《史学卷》，新文丰出版社，2003年，第763—764页。

③ 参见〔日〕榎一雄：《大月氏の大尾羊について》，《民族学研究》1949年第14卷第1号，第58—65页。

④ 参见余太山、李锦绣：《〈通典〉西域文献要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⑤ 参见〔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35章《哈马底城及其残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5—56页。

⑥ 参见赵汝适撰，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189页。

“椰”之外，类似例证还有槟榔、橘、犀、象、鹦鹉、翡翠等，都是在六朝文献中开始出现大段的详细记载性文字，可能与上文所说的汉魏之际学术方式转变有关。

再述第二类。以六朝“异物志”为代表的一批科技著作记录大量前代文献未曾著录的新知物种。日本学者森村谦一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魏晋南北朝的500年间，仅新知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就多达361种，即便删汰重复也有235种；而此后，从隋唐直到李时珍《本草纲目》诞生的将近千年之间，也仅有178种新知南方植物，距离235种仍有一定差距。^①

上文胪列的数字论据只是定量分析的结果，接下来将陈述定性研究得出的结论。考察六朝“异物志”以为，也可以发现其中涵盖新知物种之丰富，涵盖植物、动物各大门类，植物中乔木、灌木、藤类、草类、蕨类等都有涉及，动物则遍及飞禽走兽、游鱼爬虫，观察面非常之广。另外，从六朝“异物志”在物的命名方式也可以看出它们大多属于新知物种。其中的命名方式主要有3类：第一种是直接采用当地土名，如《临海水土异物志》中的枸槽子、鸡橘子、多南子、猴总子、王坛子、猴閤子等；又如《南方草物状》称，“合浦有菜，名优殿”^②，“优殿”一名便是岭南当地的土语。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对同一物的称名多种多样，在“九州异俗”逐渐走向“六合同风”的秦汉时期，许多物名也正在经历规范化的进程，扬雄《方言》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异物志”所记多为新知物种，所以多用原产地的称名。第二种是该物的外文音译。这种命名方式显示，该物或原系域外输入的物质文明，或其产地的地域文化与域外文明关联密切。如《南州异物志》记载当时岭南有五色斑布，乃古贝木所作。“古贝”可能是马来语Kapas的对音，意思为“绵布”。它还有另外一个来自梵语的语音来源，音为pata，也是“绵布”之意，《扶南异物志》《广志》中的“白叠”，《后汉书》《华阳国志》中的“帛叠”，《佛国记》中的“白氎子”，《梁书》《南史》中的“白叠子”，就是该词的梵语对音。^③第三种是不知此物的具体名字，而只知其大类，再冠以产地名称从而形成合称，可以说是“模糊的称名”，也是物质文明交流史中的一种常态。例如，《南中八郡异物志》中的合浦牛、郁林大猪、移风摇牛、麋泠大蛇、邛都大鱼等。称名是辨物识物的第一步，六朝“异物志”中出现许多新知物名，而它们的命名方式随着物质文明的进一步交融，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有些词就从原来的“音译词”变为了更为本土化的“意译词”，例如原产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之中、被当地奉为“圣果”的海枣，在《齐民要术》引晋人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写作“夫编”^④，《太平御览》引《南方记》则作“夫漏”^⑤；唐后意译名渐多，《岭表录异》《酉阳杂俎》《图经本草》等文献中皆称该果为“海枣”“波斯枣”，与“夫漏”“夫编”“无漏子”等音译名并存。

最后论述第三类，也就是目前尚不能辨识之物。正如六朝“异物志”中许多物名均系音译，涉及的语源也很复杂，不易释读。另外，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东渐之前，中国古人获取自然科学知识，主要依靠的方法就是日复一日的实地观察，再用细致的语言进行描述，所以“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情况很多，这些因素都增加名物释读的难度。在缪启愉、张崇根等老一辈农学家的努力之下，大部分六朝“异物志”中的物种已经得到较为精准的释读，并拥有相对应的规范化学名。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释》一书还特意附录一张物种拉丁文学名的索引表格，可

① 参见〔日〕森村谦一：《历代综合性本草书中新收录的植物品种的考察》，《科学史译丛》1982年第3期。

② 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51页。

③ 参见赵汝适撰，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192页。

④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0《夫编》，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724页。

⑤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960《木部九》，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4263页。

谓嘉惠学林。但是,六朝“异物志”中内容驳杂,其中仍有不少物种未能得到精准释读,亟待学界攻坚克难。例如,《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了一种名为“摩厨”的油料作物,从字音上也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外来物种,原文称:“木有摩厨,生于斯调国。其汁肥润,其泽如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食物,香美如中国用油。”^①《太平御览》卷164《岭南道》之“康州”一目下也记录当地出产摩厨。唐宋时的康州辖境在今广东德庆一带,当地的摩厨很有可能是汉魏间由东南亚国度输入的。李时珍认为“摩厨”就是《酉阳杂俎》中所说的“齐墩果”,段成式原文称:“出波斯国,亦出拂菻国……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籽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② 缪启愉指出,“齐墩”是木本油料植物阿拉伯文的古代音译,是木犀科植物“油橄榄”,“摩厨”就是“橄榄油”。^③ 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推测,目前也未能确定“摩厨”究系何物。

又如“梓栝”。一种六朝佚名《异物志》称:“梓栝,大十围,非利刚截不能克。堪作船。其实类枣,着枝叶重曝挠垂。刻镂其皮,藏,味美于诸树。”^④ 可知这是一种质地坚硬、堪造船舶的经济木材,但未知究系何物。

四 六朝“异物志”的知识归类思维

六朝“异物志”不仅记述了数量庞大的植物、动物,还对矿物以及各类人造器物有广泛志录。在面对数量宏富的物类时,必须要以一种以简驭繁、归纳整理的科学思维,才能有效掌握中古时期呈井喷式的自然科学知识。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分类”的逻辑思维,先秦墨家已有“知类”的观念。名物总结集大成者《尔雅》,其中词语大致可以分为“一般词语”和“专业词语”两大类,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归类意识。^⑤ 《尔雅》将万事万物分为“礼仪制度”“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三大类,动植物中又分为草、木、虫、鱼、鸟、兽、畜等几类。中国古代很早就把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周礼·地官》还提出以“土会之法”来“辨五地之物生”,分别指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5种不同的地形上各自适应生长的动物和植物,其中动物包含毛、羽、鳞、介、羸5类;植物则有皂、膏、核、莢、丛5类。^⑥ 《尔雅》则将植物分为“草本”和“木本”两大类,之下又分诸小类,例如“木本”之下,“小枝上繚为乔,无枝为檉,木族生为灌木”^⑦,类似于今天说的“某科某属”的概念。《尔雅》中“乔木”“灌木”的概念,直至今日仍在延续,可见其认知之超前。

六朝“异物志”也承袭先秦名物分类的科学思维,在观测新知物种自然属性的同时,也注重对物的归类。虽然六朝“异物志”大多数已经散佚,无从知晓它们是否原本就有逻辑严密的分类顺序,但从部分佚文中仍能看出分毫。例如,六朝“异物志”中有明确的“藤类”概念。陈祈畅《异物志》称:“葭蒲,藤类,蔓延他树,以自长养。子如莲,葇著格枝间,一曰作扶连。实有外壳,里又无核。剥而食之,煮而曝之,甜美。食之不饥。”^⑧ 葭蒲是桑科榕属的一种

①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0《摩厨》,第708页。

②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18《木篇》,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179页。

③ 参见缪启愉、邱泽奇辑释:《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④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0《摩厨》,第709页。

⑤ 参见许嘉璐:《〈尔雅〉分卷与分类的再认识——〈尔雅〉的文化学研究之一》,《中国语文》1996年第5期。

⑥ 参见《周礼注疏》卷2《地官·大司徒》,《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702页。

⑦ 《尔雅注疏》卷9《释木》,《十三经注疏》,第2638页。

⑧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0《藤》,第671页。

藤本植物。①《说文解字》中没有“藤”字，只收录了“滕”字，意思为“絨”，本意是捆绑箱篋的绳索，引申为捆绑之意。中国古代将蔓生缠绕他物生长的一类植物统称为“藤类”。现代植物学上的“藤本植物”也是一个宽泛概念，如按其茎叶质地可以分为“草质藤本”和“木质藤本”；按照攀附方式则有“攀援藤本”“缠绕藤本”“吸附藤本”和“卷须藤本”之别。②六朝“异物志”至少记载了十余种名字中带有“藤”的植物，它们大多确系现代植物学上说的“藤本植物”。例如“𦵏藤”，“生山中，大小如蕨蒿，蔓言生。人采取，剥之以作𦵏，然不多。出合浦、兴古”③。这可能是夹竹桃科羊角拗一类的植物，多生于两广地区的山坡或灌木丛中，藤本或灌木，高约1米余。④又如“椒藤”，也称“荳藤”，“生金封山，乌浒人往往卖之。其色赤。又云，丝草染之，出兴古”⑤，这可能是棕榈科黄藤属植物。此外，还有钟藤、野聚藤、扶留藤、蔦子藤等，不复枚举。

除了“藤类”之外，比较典型的归类项目还有“竹类”。“竹”实则是禾本科竹亚科植物，多年生草本。但是六朝人认为竹子很特殊，“植类之中，有物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⑥，故而将其单独视作一类。他们观察竹子的外部形态，认为它们迥异于一般的草木。各类竹属的外部形态虽不尽相同，但是“小异空实，大同节目”⑦，主要生长在南方大地，所谓“九河鲜育，五岭实繁”⑧。竹子在日常生活也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汉字中也产生了大量“竹”部的字。六朝“异物志”中记载了棘竹、狗竹、篋竹、筍竹、竿竹、笱竹、芳竹等不同品种，大大丰富人们对“竹”的认知。至晋宋期间，戴凯之《竹谱》诞生，记载全国各地70余种竹类，其中有诸多材料便采自“异物志”。戴凯之《竹谱》是我国第一部植物专类谱牒，也是单种植物品类的百科全书。这类物产专谱在宋后大放异彩，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世的清中叶，已需要在“子部”的“谱牒类”下单辟一类“名物谱录”了。而《竹谱》这一名物谱牒书籍，则可以说是对六朝“异物志”中“竹类”信息内容的吸收，并深度发展而形成的物产谱录专著。

五 六朝“异物志”超前的科学认知水准

六朝“异物志”对某些物类的自然属性，或者某些自然现象的认知展现出非常高的水准，即便是以当今的科学眼光衡量，也是经得住考验的，古人的智慧令人钦佩。

例如“甘蔗”一物，司马相如《上林赋》称“诸蔗獐且”，“獐且”，《汉书》中写作“巴且”，与六朝“异物志”中的“芭蕉”是同物异译。古人所说的“芭蕉”“甘蔗”是同一物，即现在俗称的“香蕉”，与今人所称的“芭蕉”是外形相似的两种植物。汉文典籍中首次对“甘蔗”物性进行详细描述，当推万震《南州异物志》：

甘蔗，草类，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华（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茎末百余子，大名为房。根似芋魁，大者如车毂。实随华（花），

① 参见缪启愉、邱泽奇辑释：《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第48页。

② 参见《辞海》（生物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5年，第379页。

③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0《藤》，第671页。

④ 参见缪启愉、邱泽奇辑释：《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第48页。

⑤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0《藤》，第671页。

⑥ 戴凯之：《竹谱》，《百川学海》第30册《癸集上》，民国16年武进陶氏涉园影宋本，第2页。

⑦ 戴凯之：《竹谱》，《百川学海》第30册《癸集上》，民国16年武进陶氏涉园影宋本，第2页。

⑧ 戴凯之：《竹谱》，《百川学海》第30册《癸集上》，民国16年武进陶氏涉园影宋本，第2页。

每华（花）一阖，各有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华（花）不俱落。^①

《南州异物志》不仅详细记载甘蔗植株的形状、大小、花色、花期、果实等信息，更精准地指出：甘蔗虽然形大如树，但却是“草类”。以现代植物学知识不难知晓：香蕉属于芭蕉科芭蕉属植物，植株丛生，具匍匐茎，茎干高大，即便是矮型植株也可达到3.5米左右，高型的则一般在4米至5米之间，且的确属于草本植物，《南州异物志》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②并且，六朝人已经认识到“甘蔗”的果实不止一个品种，至少有“子大如拇指，长而锐”的“羊角蕉”，“子大如鸡卵，有似牛乳”的一种，以及“蕉大如藕，长六七寸，形正方”的“方蕉”。当然，以今天的植物学知识不难清楚，香蕉果实的品种有上百种之多，远不止3种，但六朝人通过肉眼观察而达到此等认知地步，实属不易。

又如六朝“异物志”中对榕树生长方式的记载：

榕木，初生少时，缘搏他树，如外方扶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缘绕他木，傍作连结，如罗网相络，然后皮理连合，郁茂扶疏，高六七丈。^③

榕树的寿命很长，而且能够孤木成林。它是桑科无花果属（榕属）植物，这个属类的有些品种确实是缠绕植物。榕树的生长正如上文《齐民要术》引《南州异物志》所言，“初生少时……不能自立根本”，而是会发出气根缠绕在寄主的树干上，之后这些气根会加粗、连接，最终形成网状，甚至将寄主缠绕死而自成一大乔木。

六朝“异物志”中闪耀着科学光辉的超前认知的例证非常多，如当时人已经认知到在今中国南海的海域底部存在暗礁，会影响船舶航行，故称“涨海中多奇石”；时人也认识到并非所有鲨鱼都是卵生的，还有一部分是胎生（如双髻鲨）或卵胎生（如鯖鲨）的，于是留下了“鲭鱼惊入母腹”的记载。在现代自成体系的自然科学形成之前，六朝人以自身的智慧及描述性的文字记录下了自身对自然万象的观察，为今人留下一笔可贵的科学遗产。

六 六朝“异物志”知识的承袭与传播

如果说六朝“异物志”中所载自然科学知识未得到后世的承袭与传播的话，那么它们就如同一个未曾开启的宝库，其价值未为世人所发现。所以，梳理历代文献，陈述它们与六朝“异物志”知识谱系之间的承载关系，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博物之学的发展脉络。

在“异物志”的传播过程中，最先意识到它们的文献价值的，是魏晋时期的一些训诂学家，比如薛综（字敬文，吴人）、刘逵（字渊林，西晋人）、张载（字晋安，西晋人）、郭璞（字景纯，两晋之交人）等。他们在为一些都邑大赋作注的时候，经常积极援引“异物志”，来释读赋中的某些珍异物产。事实上，都邑赋与地志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左思写作《三都赋》时就声明自己赋作中的地名、物名，皆是“考之方志”的。一般认为，都邑赋有“赋代史乘”的功效，但是要清楚，都邑赋毕竟属于文学作品，要考虑到叶韵、用典、辞藻、属对等诸多语言修辞问题，有时候

①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0《芭蕉》，第620页。

②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植物志》第16卷第2分册《被子植物门》，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页。

③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0《榕》，第707页。

避免对名物称谓进行缩减,也由此造成语义释读的困难,因此需要有“异物志”这类科技文献作为辅助工具用书。例如左思《蜀都赋》中有一句称“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刘逵注就引用杨孚《交州异物志》来释读“龙目”“荔枝”二物,指出“龙目”就是“龙眼”。左思此处用“龙目”而不用“龙眼”,有考虑音韵协调的问题;遇到“螫蜥山栖,鼃龟水处”一句,刘逵又引用譙周《巴蜀异物志》称:“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玳瑁,俗名曰灵”^①,这样的引文能立即让读者明白“鼃龟水处”一句的文化内涵,不仅做到了“释物”,还做到了义理阐发。刘逵这种作注方式在《蜀都赋》《吴都赋》中还有很多,这种注解方式既看得出他通过阅读“异物志”达到的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熟稔,又可以看出他对“异物志”所载知识的应用与传播。

六朝“异物志”书写范围主要集中在南方,其传播范围却非常广泛。南北朝时,南朝政权与北朝政权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中断,“异物志”也随着地域文化交流而越过国境线,来到中原大地,成为北方士人了解南方风物土宜的重要渠道。除上文例举的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所提及的一处例证外,酈道元与贾思勰也是熟读“异物志”的大学者。贾思勰对“异物志”的阅读上文已述,不复赘述。酈道元则是通过搜罗天下奇书,来为他从未踏足过的南方大地上的各大河流作注。他在《水经注》中说,近推得到康泰《扶南传》^②一书,颇感兴奋,并且不止一次地引用《扶南传》中的文字。例如,酈道元曾引《扶南传》指陈印度河谷地出产一种白色戎盐,“白如水精,大段则破而用之”,并远销月氏、安息等地。^③除《扶南异物志》外,《凉州异物志》也记载了西域出戎盐。实际上,印度戎盐在中古中亚地区非常有名,并通过西北丝绸之路等渠道传入我国。它们不仅有白色的,还有赤色的、紫色的等各种颜色,因其中所含矿物质成分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颜色。印度戎盐在古代波斯以及之后大食国的医疗体系中拥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极富药用价值的材料。伊本·贝塔尔的《医典》中就有“食盐”一条,并指出:“印度盐是红色的”,又称它可以治疗黄疸水,同时有驱风、润肺、通便、祛痰、止心痛的药效。^④唐代之后,我国也逐渐认识到戎盐的药效功能。唐人苏敬《新修本草》和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都有关于“印度戎盐”的记载。此外,在《北户录》《梁四公记》等地理笔记中,也都有“赤盐”“桃花盐”的记载,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戎盐文献记载体系,而这一知识体系的源头,则可以追溯至六朝“异物志”。

除上述宏观层面的知识接受外,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也可以看到六朝“异物志”知识在后世文献中的承袭脉络。比较典型的是历代文献对“捕捞珊瑚”技术的记载。劳费尔认为,中国古代本土原不认识珊瑚,直到与大秦(亚细亚希腊)相交通才知道了真珊瑚。^⑤汉文文献中较早可见的对珊瑚有详细记载的,是万震《南州异物志》:

珊瑚生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距其国七八百里,名珊瑚树。洲底有盘石,水深二十余丈。珊瑚生于石上,初生白软,若似菌。国人乘大船,载铁网,先没在水下,一年便生网目中,其色尚黄,枝柯交错,高三四丈尺,大者围尺余。三年色赤,便以铁钐发。其根系铁网于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4《蜀都赋注》引譙周《巴蜀异物志》,第213页。

② 按,即《扶南异物志》。

③ 参见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河水注》,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3页。

④ 转引自宋岷考释:《回回药方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2—14页。

⑤ 参见[美]劳费尔撰,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53页。

船。绞车举网，还裁凿，恣意所作。若过时不凿，便枯索虫蛊。其大者输之王府，细者卖之。^①

“珊瑚”其名，薛爱华（E. Schafer）认为是这个词是古波斯语“石头”（Sanga）的音译。^②其外形酷似植物，古人常称为“珊瑚树”。直到近世，人们才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动物。海底的珊瑚是由一种叫做“珊瑚虫”的小腔肠动物堆积而成的。正如《南州异物志》所言，珊瑚初生时“白软，若似菌”，之后在其生长过程中，为了吸收阳光和捕捉食物，珊瑚群会不断向四周延伸。待到死去之后，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石灰质遗骨堆，继续吸引后续的珊瑚虫前来附着。《南州异物志》中关于大秦国捕捞珊瑚的详细记载，成了后世了解这种生物的最初知识来源，其知识继承脉络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如晋人徐衷《南方草物状》称“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③；在谈及珊瑚的捕捞方式时，宋元文献也多因袭万震所言，《新唐书·拂菻传》称：

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盘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④

《新唐书》中类似文字还可以在赵汝适《诸蕃志》中看见。^⑤直至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还保留着相似的文字，应该还是绍继自《南州异物志》而略有文字改动而已。^⑥

此外，如对槟榔、椰、沉香、甘蕉等物类的记述，在六朝“异物志”中就已经达到一定的认知高度，故当后世地理笔记、物产谱牒、地方志再对它们进行物性描述时，其文字风格多有绍继六朝“异物志”之处，或在其基础上再进行增补，成为一种历代传承的公共知识。这也使得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之前，我国古代的博物学知识呈现出注重历代文献传承的特点。

结 语

六朝“异物志”是中古物产专志的主要撰述形式，它们结束早期物产信息散布于经注、史注、集注、农书、字书等各类文献中的零散状态，开启一类注重关注“物”的专志的写作风气。唐后命名方式更为多样化的各类地理杂记，例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唐段公路《北户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清周亮工《闽小记》、清檀萃《滇海虞衡志》等，它们都延续六朝“异物志”科学观物的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一个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文献群体。但是，这些文献分布散乱且多有佚失，对其中所记内容进行释读，将是一项有利于深度了解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发展脉络的益事。本文仅以几种重要的六朝“异物志”为研究对象，解读其中的科学价值贡献，至于其余古代物产专志中所体现出的自然科学史信息，则亟待进一步挖掘。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1035页。

② 参见[美]谢弗撰，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68页。

③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7《美女篇》引徐衷《南方草物状》，第1287页。

④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261页。

⑤ 参见赵汝适撰，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200页。

⑥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9《四裔考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659页。